

《石渠宝笈》著录女画家作品辨伪

李 湜

内容提要 《石渠宝笈》是清乾隆、嘉庆两朝皇帝谕敕编纂的大型以书画为主的著录文献，由于各种原因，所著录作品并非都是真品，其中 10 位女画家的 49 件（套）作品即真伪混杂。本文利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，通过款识、印章、画风等对《石渠宝笈》中的马守真、杨婕妤、管道升作品进行辨别考证，指出马氏的《画兰》卷、杨氏的《百花图》卷以及管氏的《竹溪览胜》轴、《画茄》轴、《竹石》轴等皆是伪作，从而为科学认知清宫藏品和古代女画家作品提供参考。

关键词 《石渠宝笈》 乾隆皇帝 马守真 杨婕妤 管道升

乾隆九年(1744)，张照、梁诗正等人受乾隆皇帝敕命将宫中所藏重要书画详细著录，次年成书《石渠宝笈》。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，王杰、阮元等人受乾隆皇帝的敕命又编撰成《石渠宝笈》续编。嘉庆二十年(1815)至二十一年，英和、吴其彦、胡敬等人受嘉庆皇帝的敕命，再编成《石渠宝笈》三编。尽管所有编纂者均学识渊博、精于文翰，且三编所收录者都经过认真甄别，但是，由于多种原因，也难免有所失误。目前，经过几代书画鉴赏家的努力，已考证出有数百件赝品混入其内，如董其昌款《秋林书屋图》轴(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)、钱选款《西旅贡葵图》卷(《石渠宝笈》续编著录)、沈周款《瓶中腊梅图》轴(《石渠宝笈》三编著录)等等。在为《石渠宝笈》初至三编所著录的女画家作品中，也存在着真赝混杂的现象，可以说，署马守真^{〔1〕}、杨婕妤^{〔2〕}、管道升^{〔3〕}名款的画作均为赝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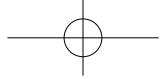
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的“明马守贞《画兰》一卷”^{〔4〕}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，落款为“湘兰马守贞”

〔1〕 马守真(1548—1604)，小字玄儿，又字月娇，号湘兰。金陵(今江苏南京)人。聪颖机敏，能诗擅画，又轻财重义，为秦淮名妓。往来于江南文人墨客间，尤与著名文士王稚登(字伯谷)最为友善。

〔2〕 杨婕妤，生平不详。“婕妤”是妃嫔的封号。或认为其与南宋宁宗(1195—1224)恭圣杨皇后之妹杨妹子是同一人，但未成定论。

〔3〕 管道升(1262—1319)，字仲姬，又字瑶姬，号栖贤山人。吴兴(今属浙江)人，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妻。能词章，工绘竹，笔法娴熟。元延祐四年(1317)封为“魏国夫人”。

〔4〕 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：明马守贞《画兰》一卷(次等李一，贮御书房)，素笺本，墨画。款题云：“莫讶春光不属依，一香已足压千红。总令摘向韩娘袖，不作人间脑麝风。丙寅春三月偶写，湘兰马守贞。”《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·石渠宝笈初编》第2册页1058，北京出版社，2004年。



〔图一〕马守贞《墨兰图》卷（局部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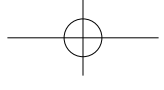
〔图一〕。笔者曾撰《〈石渠宝笈〉著录马守贞〈画兰〉卷考》^{〔1〕}一文，对该画卷进行了专门考证，认为它最大的疑点是将落款中马守真的“真”写作了“贞”。马守真作为金陵名妓，在贞洁观、贞操观浓厚的明代，断不会把自己的名字“守真”与“守贞”混淆使用。此外，该幅还有其他方面的纰漏，如在题材上，图中所绘是与兰相近的“蕙”，而马守真只画“兰”，因此，她有“湘兰”之号。又，在款题的“湘”字写法上，大量的马氏画作证实，其“木”与“目”总是左右并置，而此幅则是将“目”直接地写在了“木”撇之上，显然作伪者不了解马氏的落款特点。此外，该幅还存在画与墨题之间不合常理的布局关系，画风与马氏所追求的吴门画派笔墨不相符的现象，以及钤印不符合马氏钤章组合的规律等等。总之，此幅应当是件添马氏伪款之作。

《石渠宝笈》著录的杨婕妤《百花图》卷^{〔2〕}以及管道升的作品，许多是经明清时期梁清标、宋荦、卞永誉（字令之）、安岐等人鉴藏过的，作品曾受到了这些著名鉴藏家的高度重视和珍爱，有的甚至作为贡品献给了皇室。如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的杨婕妤《百花图》卷〔图二，现藏吉林省博物馆〕，便应是敬献之作。该图卷入宫前所钤的十余方藏印，全部是梁清标的私人印，有“蕉林梁氏书画之印”、“河北棠村”、“秋碧”、“蕉林书屋”、“苍岩”、“蕉林鉴定”、“冶溪渔隐”、“蕉林”、“苍岩子”及“蕉林秘玩”等。梁氏自1691年过世后，其藏品被当时财大气粗的安岐所收购，《钱文端公年谱》^{〔3〕}记：“麓村安氏精鉴赏，凡携李项氏、河南卞氏、真定梁氏所蓄古迹，均倾赀收藏。”清代天津诗人查礼在《铜鼓书堂遗稿》中谈到安氏藏品的来源，也有着类似的说法，称安氏“倾家收藏项元汴、梁清标、卞永誉所藏书

〔1〕 李湜：《〈石渠宝笈〉著录马守贞〈画兰〉卷考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9年第4期。

〔2〕 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：宋杨婕妤《百花图》一卷（上，一等，贮御书房）。素绢本，着色画。无款。姓氏见跋中。凡十七段。每段楷书标花名并纪年诗句于上。前总识云：“今御制中殿生辰诗”，下注云：“四月八日”。第一段识云“寿春花”，下注“己亥庚戌”四字，诗云：“上苑风和日暖时，奇葩色染碧琉璃。玉容不老春长在，岁岁花前醉寿卮。一样风流三样妆，偏于永日逞芬芳。仙姿不与群花并，只向坤宁荐寿觞。”第二段识云“长春花”，下注：“庚子甲辰己未”六字，诗云：“花神底事脸潮霞……（略）”卷前有“蕉林梁氏书画之印”一印。卷中幅有“河北棠村”、“秋碧”二印。前隔水有“蕉林书屋”、“苍岩”、“蕉林鉴定”三印。后隔水押缝有“冶溪渔隐”、“蕉林”二印。拖尾跋语云：“右《百花图》一卷，乃杨婕妤画也。婕妤盖宋光宁时人，说者谓与马远同时，后以色艺选入宫。其绘事过人，自能题咏，每流传于人间。此其所画以寿中殿者也。予得于吴中好事家。今逢唐贤妃殿下千秋令节，敬献以祝无疆之寿云。弘治丙辰春三月吉日识。”下有“三城王图书”一印。盖明室诸藩也。后有“苍岩子”、“蕉林秘玩”二印。卷高七寸四分，广二丈一寸五分。”前揭《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·石渠宝笈初编》第2册页995。

〔3〕 （清）钱仪吉、钱泰吉：《钱文端公年谱》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刊本。



〔图二〕杨婕妤《百花图》卷（部分） 吉林省博物馆藏



画，所度名迹甲于海内”。的确，安岐《墨缘汇观》所记作品中，有许多是梁氏旧藏。

不过，梁氏有不少藏品在安岐购藏之前，就已被敬献到了宫里。作为明王朝的重臣，梁氏在顺治、康熙两朝也受到重任，曾先后担任兵部、礼部、刑部、户部尚书，后授保和殿大学士，职位显赫。为了感谢清朝皇帝不计前嫌的皇恩或为了向清皇室邀宠，梁氏向宫廷献上自己的藏品不是没有可能。因此，刘金库先生指出：“梁清标书画收藏的目的之一是‘养取葵心向紫宸’，紫宸为皇宫别称，是专门进献给皇帝的。如梁清标收藏过的王渊《竹雀图》（现藏大阪市立美术馆）就是被送进了清内府。这一点，我们从现在所能辑佚出来的《棠村辑佚目录》与安岐《墨缘汇观》的书画目录对比中可知，梁清标所收藏过的书画，许多是没有经过安岐之手，就已经进入了清内府。”^{〔1〕}杨婕妤《百花图》卷上没有安岐等藏家的印，只有梁清标的鉴藏章，因此，它很可能像王渊的《竹雀图》一样，由梁氏直接敬献给内廷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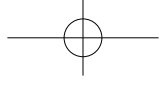
张伯驹先生在其《丛碧书画录》^{〔2〕}中称杨婕妤的《百花图》卷是真迹（《百花图》卷卷首有张伯驹钤印）。吴其贞在其《书画记》中亦夸此卷真且妙，云：“杨妹子绢画一卷，十七则。气色佳，画天日云三则，余皆花卉，法简而文，绝无画家气。”^{〔3〕}

但是，徐邦达、杨仁恺先生均对此画提出了质疑。徐先生认为，此卷出自南宋宫廷画师之手，

〔1〕 刘金库：《南画北渡——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年。

〔2〕 故宫博物院编：《赵伯驹潘素捐献收藏书画集·附录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1998年。

〔3〕 明末吴其贞：《书画记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》第八册，页60。上海书画出版社，1994年。



称：“南宋院人作，非杨笔。”^{〔1〕}杨先生在《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及其考证》中记：“此卷早已闻之，惟迄未见及。1959年去京，始闻此卷曾送故宫博物院，经鉴定不真退回。旋卖与张伯驹。通过周怀民向张妻潘素求看，细观卷中一诗一画，画上花卉均有题名，同时书甲子，多至三个，不解何故。后面山水设色风格为马、夏一流，而花卉则迥非院体（粉已反铅），反而有民间之风，此当是故宫博物院不收之根据欤？”^{〔2〕}言明此图的山水、花卉与杨氏风格不相符。事实上，更重要的一点是，此《百花图》卷原是幅无作者款印的佚名之作，画卷本身没见有落款，《石渠宝笈》著录亦言：“着色画。无款。姓氏见跋中。”它的定名缘于明代三城王朱芝堦^{〔3〕}的跋。弘治丙辰（1496）春，朱芝堦决定将此图敬献给唐贤妃，以祝她千秋之寿，为了显示贺礼的贵重，或为了表示贺礼的贴切，他不仅将这件本无名款的佚名之作。直接定名为宋代皇室女子杨婕妤所作，还编造说杨婕妤这件作品本身就是幅祝寿之作。云：“右《百花图》一卷，乃杨婕妤画也。婕妤盖宋光宁时人，说者谓与马远同时，后以色艺选入宫。其绘事过人，自能题咏，每流传于人间。此其所画以寿中殿者也。予得于吴中好事家。今逢唐贤妃殿下千秋令节，敬献以祝无疆之寿云。弘治丙辰春三月吉日识。”朱芝堦本是位喜好收藏的皇族子弟，并没有过多的鉴藏能力。因此，他将此卷定名为杨氏之作，应该说完全是出于自身需要，不具有学术权威性。此幅不过是假托杨氏之名的宋代佚名画而已。

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的管道升《竹石》轴〔图三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〕^{〔4〕}，曾为宋荦收藏，也应该是通过敬献途进入宫的。宋荦出身官宦世家，其父宋权（谥文康）深得顺治、康熙皇帝赏识，享有“清廉为

〔图三〕管道升《竹石》轴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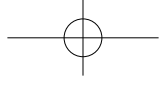


〔1〕 徐邦达：《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》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97年。

〔2〕 杨仁恺：《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及其考证》，《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·第三辑》页49，辽海出版社，2009年。

〔3〕 朱芝堦（？—1511），明朝宗室，唐宪王之子，为三城康穆王，别署“三城王”，安徽凤阳人。

〔4〕 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：元管道升《竹石》一轴（上等月一，贮御书房）。素笺本，墨画。无款。左下方有“魏国夫人赵管”一印。右下方有“商邱宋荦审定真迹”一印。诗塘董其昌识云：“管魏国写竹，自文湖州一派，劲挺有骨，与宋广平作赋正相反，或曰吴兴借之为名。董其昌题。”轴高二尺七寸，广八寸九分。前揭《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·石渠宝笈初编》第2册页1105。



天下巡抚第一”的美誉。其子宋至^①、宋筠^②、宋致^③在康熙、雍正朝亦纷纷被委以重任，始终与清王室保持着良好的君臣关系。宋萃于康熙五十二年(1713)过世后，他的书画收藏为其子所继承。关于藏品的最终流向，刘金库先生推测：“一是许多书画到了张照^④的手上，如元代方从义的《东晋风流》(王已千藏)等；另一个去向是到了安岐手上，后来主要藏品经张照、安岐等人之手而进了清乾隆内府。”^⑤除了这两个流向外，还存在另一流向，即历代为官的宋家因与皇室关系密切，有一些作品被宋萃或其子直接敬献给了皇室。据宋萃《西陂类稿》记载，他在江宁任巡抚十四年，先后四次迎康熙皇帝南巡，每次君臣之间都有大量的礼品互赠活动。康熙皇帝曾赐给他御笔书《西陂》、《仁惠誠民》、《福》、《寿》等，还有食品葡萄、哈密瓜、鱼干、鹿肉等。为了谢恩，宋萃则多以家藏书画或书籍作为敬献品，如他在《迎銮纪》中记：“康熙三十有七年冬十二月……臣萃进书画数种，蒙收六种”^⑥；《迎銮二纪》记：“皇上御宇四十有二年……臣萃恭进《万寿诗七律百韵》一册，并进家藏书画数种。蒙收万寿诗及书籍、墨迹六种。”^⑦《迎銮三纪》记：“康熙四十四年正月……臣进呈书画等物，上收七种。”^⑧此幅管道升《竹石》轴上除钤有宋萃的藏印外，没有其他鉴藏者的印迹，在安岐的《墨缘汇观》^⑨中也没见到对此图的著录，因此，它很可能是宋萃当年所“进书画数种”之一。

徐邦达先生在《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》中指出：“管道升《竹石》轴，伪。”台湾学者陈葆真先生通过对管道升竹画风格的研究，以及对此图中具体物象竹枝、叶的表现手法分析，加之对“魏国夫人赵管”钤印的考证，明确表示此图不是管氏的亲笔之作，她说：“根据历代著录所记管的竹风而考，此画非管画。”同时，她指出该图系明代作伪：“此图的造型正是元人所要避免的画法，它的画法很可能是接受了方厓、王绂、夏昶和文徵明这一些人的影响之后才产生的作品，故它应晚于文徵明，它

① 宋至(1655—1725)，字山言。宋萃子，康熙四十二年(1703)进士，入武英殿纂修《佩文韵府》。五十一年为浙江学政，推崇苏轼之词，力矫文风之弱。与朱彝尊、王士禛等文士多有交往。著有《纬萧草堂诗集》。

② 宋筠(1681—1760)，字兰挥。宋萃子，康熙四十八年(1709)进士。官至山西按察使、江西布政使等职。晚年以疾退隐，著有《绿波图诗集》、《传溟录》。

③ 宋致(生卒年不详)，字穉佳。宋萃子。举乡贡，游太学，官至四川总藩、湖南布政使。性情慷慨轻财，有政事，著有《可竹居诗集》、《擢秀堂诗集》。

④ 张照(1691—1745)，字得天，号泾南、天瓶居士，江南娄县人，康熙四十八年(1709)进士，官至刑部尚书，雍、乾朝重要的文臣，谥文敏。博学多才，深通释典，工于书法兼绘兰、墨梅等。著《天瓶斋书画题跋》、《得天居士集》，刻有《天瓶斋帖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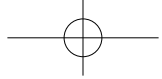
⑤ 刘金库：《南画北渡——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年。

⑥ (清)宋萃：《西陂类稿·迎銮纪》卷四〇页十一，光绪五年(1879)铅印本。

⑦ (清)宋萃：《西陂类稿·迎銮二纪》卷四一页八，光绪五年(1879)铅印本。

⑧ (清)宋萃：《西陂类稿·迎銮三纪》卷四二页八，光绪五年(1879)铅印本。

⑨ 《墨缘汇观》：由著名收藏家安岐依自己所藏和过目的书画在乾隆八年(1743)编纂而成，全书共四卷，法书两卷，名画两卷。上起魏晋，下迄明末，涉及二百余位作者，是一部重要的书画著录书。



与孙克弘的《朱竹图》轴在笔墨上有相似处。”¹¹

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的管氏《竹溪览胜图》轴〔图四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〕¹²，曾经卞永誉鉴藏。其上钤有卞氏的鉴藏印“式古堂书画”和“卞令之鉴定”。但是，却不见卞氏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著录，推测应该是康熙二十一年(1682)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初刻后才入藏于卞氏的。

《竹溪览胜图》轴最大的纰漏在其款识上〔图五〕，款云：“至大二年魏国夫人赵管。”至大二年是1309年，管氏尚未被封为“魏国夫人”。管氏被封为魏国夫人是延祐四年(1317)的事，见赵孟頫《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》记：“延祐四年余入翰林为承旨，加封魏国夫人”¹³，因此，如果是至大二年之作，就不可能落“魏国夫人赵管”款。此外，陈葆真先生认为此画所体现出的画风，“带有明中以后吴派画疏秀的作风。”¹⁴因此，她也认为该图“不可能是元朝画”¹⁵。款文的时间与印文对不上的还有《石渠宝笈》三编著录的管道升画《竹》并书《修竹赋》卷¹⁶，此图款“至大三年八月廿四日”，钤“魏国夫人赵管”印。至大三年是1310年，同上所述，管氏尚未被封为“魏国夫人”，因此该画当是后人伪作。

〔1〕 陈葆真：《管道升和她的竹石图》，《故宫季刊》1977年第11卷。

〔2〕 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：元管道升《竹溪览胜图》：“一轴(上等景一，贮养心殿)。宋笺本，墨画。款识云：‘至大二年魏国夫人赵管’。下一印不可识。又，‘式古堂书画’一印，又，上有半印不可识，左方下有‘卞令之鉴定’一印。轴高一尺七寸八分，广九寸二分。”台北故宫博物馆编委会：《故宫书画图录》第四册页91，台北故宫博物馆出版，2002年。

〔3〕 元赵孟頫：《松雪斋全集》外集，页10，光绪洞庭杨氏刊本。

〔4〕 陈葆真：《管道升和她的竹石图》，《故宫季刊》1977年第11卷。

〔5〕 陈葆真：《管道升和她的竹石图》，《故宫季刊》1977年第11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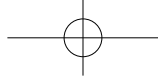
〔6〕 《石渠宝笈》三编著录：元管道升画《竹》并书《修竹赋》真迹(一卷)本幅：绢本，纵八寸四分，横一丈一尺六寸。水墨画竹。自题：“至大三年八月廿四日，在松雪斋写。夫戏弄笔墨，男子之能事，吾今作此，得非越分乎！可鄙可鄙。仲姬。”钤印一“魏国夫人赵管”。幅首书《修竹赋》：“猗猗修竹，不卉不蔓(略)……赵管仲姬录。”钤印二“赵管”、“魏国夫人赵管”。引首：“闰阊清风”，款“逸老”。钤印一“伯颜不花印”。鉴藏宝玺：五玺全，“宝笈三编”。前揭《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·石渠宝笈三编》第11册页3085。

〔图四〕管道升《竹溪览胜图》轴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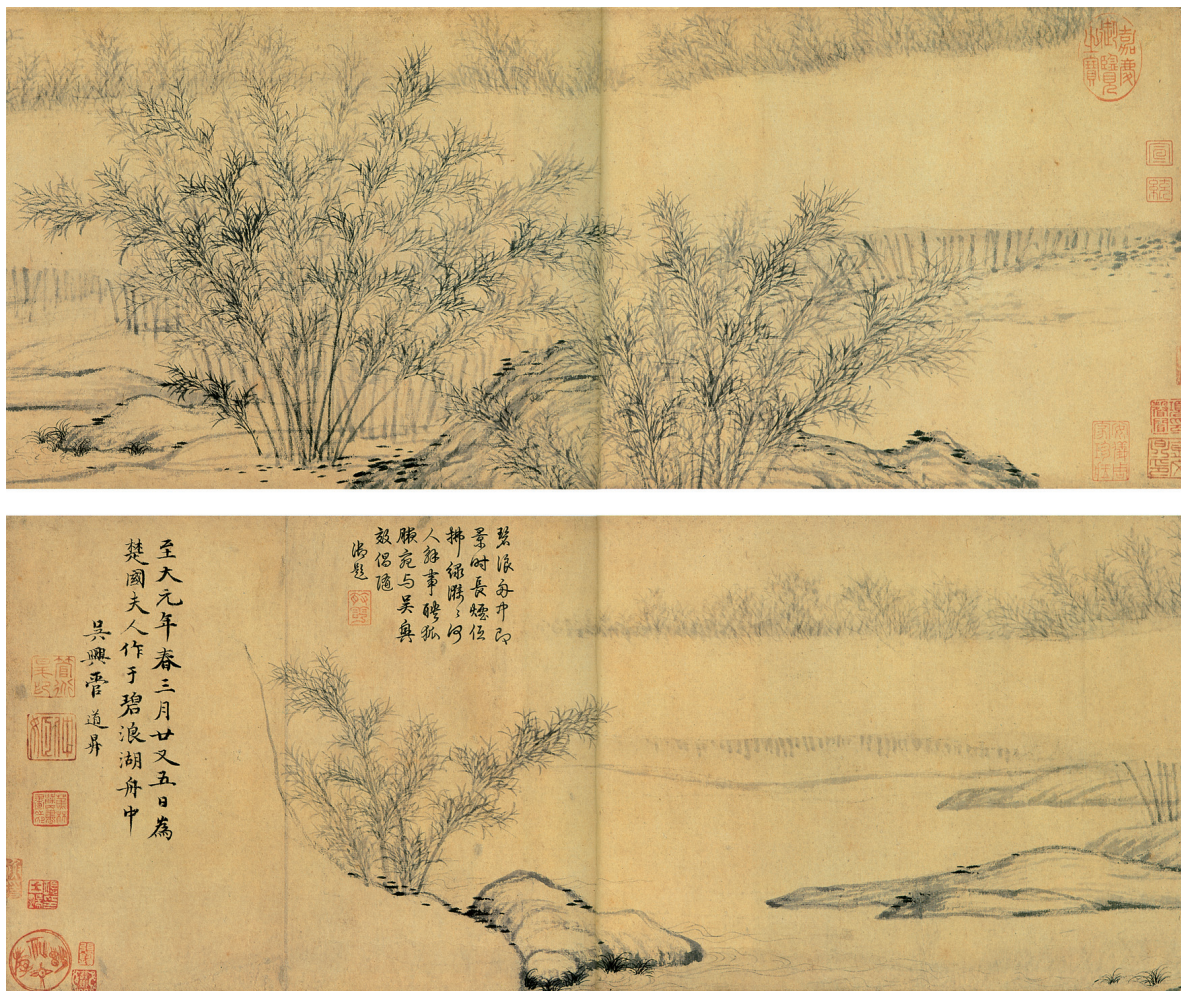


〔图五〕《竹溪览胜图》款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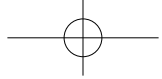


〔图六〕元管道升《烟雨丛竹图》轴（局部）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



《石渠宝笈》续编著录的管道升《烟雨丛竹图》卷〔图六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〕是经过多位名家鉴藏之作。该图原本是《元人集锦》卷（赵孟頫、管道升、倪瓒等八人画作合裱卷）中的第二幅^{〔1〕}，乾隆皇帝于“己巳（1749）”御题此卷称：“是卷汇集元人横幅，共八家。盖樵李项所藏。”通过画卷所钤“王徽尚文家藏”、“梁清标印”、“安岐周家珍藏”等印鉴可知，此卷实际上不止为项元汴所藏，还被其他的鉴藏家珍藏过。从时间上排比，安岐是其入藏皇宫前的最后一位藏家。此图亦被安岐《墨缘汇观》第四卷“名画下”著录，其云：管道升《万竿烟雨图》，“白纸本，高六寸八分，长三尺三寸余。水墨。作淡墨细竹沙渚遥浦，其间烟雾横迷，万玉幽深，茫茫有渭川千亩之势。坡陀皴法大类松雪，布景一派平远天真，秀妙绝伦，实为佳品。后款题：‘至大元年春三月廿又五日为楚国夫人作于碧浪湖舟中。吴兴管道升。’”

〔1〕（清）彭元瑞、王杰、阮元等编纂：《石渠宝笈》续编著录：《元人集锦》，本幅，素笺本，八幅，第一赵孟頫（略）……第二，纵七寸一分，横三尺五寸，管道升水墨画《烟雨丛竹》，款：“至大元年春三月廿又五日为楚国夫人作于碧浪湖舟中。吴兴管道升。”钤印二“管道升印”、“仲姬”。第三，倪瓒（略）……前揭《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·石渠宝笈续编》第3册页518。



舟中。吴兴管道升。’后押朱文‘管道升印’、‘仲姬’朱文印。前下角有朱文‘金文鼎印’。边‘山人’二字白文半印。又‘项姓’朱文一印。后钤‘渔隐’白文半印。下角有朱文圆印。”需要说明的是，《墨缘汇观》名此图为《万竿烟雨图》，与《石渠宝笈》所定《烟雨丛竹图》之名不同。事实上，此图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即清初吴升《大观录》所称的《竹林泉绕图》^①。目前，台北故宫博物院依据《石渠宝笈》的定名而称之为《烟雨丛竹图》卷。

陈葆真先生认为管道升《烟雨丛竹图》卷真贋难辨。她说“此图古朴精湛，似出于相当水准的画家之手。再说全图的布局平实简净，由近推远，极富空间的感觉，笔墨又甚厚润；纸张似为元代楮纸。集合这些因素，让人觉得它可以是张元朝画，甚至极可能是管的真迹。”^②此画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，管氏的落款与画心不是在同一张纸上，而是分别书、绘在两张纸上，然后拼接成一个长卷。因此，后接纸上的款识，不但不能证明此图是管氏所绘，反而令人们对这种拼接的样式产生更多的怀疑。此外，该图墨竹呈现出一种刻板画风，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《赵氏一门三竹图》卷内之管画的墨竹有较大的差异。因此，徐邦达先生在《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》中，便明确指出：“《元人集锦》卷（赵孟頫、管道升、倪瓒、吴镇、马琬、赵原、林子兔、庄麟），管伪，余真，上上。”

《石渠宝笈》著录的管道升画作中，属于凭空捏造的还有几件，其中最典型的是《石渠宝笈》三编著录的管道升《画茄》轴^③〔图七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〕。著录记：“本幅：纸本，纵一尺六寸二分，横八寸八分。水墨画茄。钤印三‘赵王孙’、‘天水赵氏’、‘魏国夫人赵管’。轴内分钤高宗纯皇帝宝玺：‘乾隆御览之宝’、‘乾隆鉴赏’。鉴藏宝玺：五玺全，‘宝笈三编’。收传印记：‘天藻亭’、‘魏仲房’。”管氏是1317年被封魏国夫人的，1319年便过世了，因此，她能用“魏国夫人”头衔作画、钤印的时期很短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两年左右的时间并不是她艺术创作上的鼎盛期。赵孟頫《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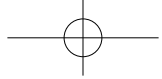
〔图七〕管道升《画茄》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

① （清）吴升：《大观录》：“管仲姬《竹林泉绕》：夫人名道升字仲姬，吴兴人。魏公室封魏国夫人。聪明有才略，解词章。能诗画以写竹擅名。仁宗尝命取魏公、夫人及子雍书画装为一卷。识以御宝，藏之秘书监，曰：使后世知吾朝有一家父子夫妇善画者也。图黄纸本，高七寸阔三尺余，细竹长林石泉紫拂，着浅青色，嫩梢丛叶间微作云气烘锁觉深窈不穷。‘至大元年春三月廿又五日’为楚国夫人作于碧江湖舟中。吴兴管道升。”见《中国书画全书》第八册，页526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1994年。

② 陈葆真：《管道升和她的竹石图》，《故宫季刊》1977年第11卷。

③ 《石渠宝笈》三编，前揭《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·石渠宝笈三编》第10册页1581。



记管氏“子三人，亮早卒，雍、奕，女六人”¹，养育九个子女，令管氏长期为繁重的家务所拖累，到了晚年，身体日渐病弱，使她难得有闲情与精力再执笔写字作画了，以致出现了代笔²的现象。许多落其款的家书，已被公认为由赵孟頫代笔完成，如《深秋帖》³、《二哥久出帖》⁴、《久疏上状帖》⁵等等。《赵氏一门三竹图》卷中，她的竹画，虽然尺寸很小，仅纵34厘米，横57厘米，但是也是由赵孟頫补笔后才完成的。此图在表现题材上也令人生疑，赵孟頫在为管氏所作的墓志铭中，提到她的绘画才艺，仅言她擅绘竹，并因向皇室献所画之竹，而获得奖赏：“画墨竹及设色竹图以进，亦蒙圣奖，赐内府上尊酒。”⁶此图却独以茄子为表现主题，可谓是署管道升款的孤本孤证。徐邦达先生在《徐邦达文集·古书画鉴定概论》中指出，有一种“造”的作伪方法，“根本不管某人的作品是怎样，随意凭空伪造，写上一个名字就算数。……用这种方式来作伪画的原因，主要是取其无有对证，易于欺人”⁷。此图当属“取其无有对证”的伪造之列。此图的另一个纰漏是，画中不落名款，而是将代表管氏和赵孟頫的印同时钤上，即，除钤有“魏国夫人赵管”印外，还钤有“赵王孙”和“天水赵氏”，从而诱使人们或认为此图是管氏所作，或认为是赵孟頫之笔，或认为是管、赵的合作。目前，台北故宫博物院根据《石渠宝笈》将此图的作者定为管道升。从画风上分析，其粗放方硬的笔墨为明前期孙隆的画法，与元人的笔墨风格不相符，当属伪作。

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的管道升《新篁坡石图》（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）也属于伪造之作。此图绘于赵氏《枫林抚琴图》卷之上，实际上是在赵氏所绘的坡地上加绘二丛青竹，因此，《石渠宝笈》称之为“元赵孟頫、管道升合作一卷”，著录曰：“元赵孟頫、管道升合作一卷（次等余一，贮御书房），素笺本。赵孟頫著色画《枫林抚琴图》，款云：‘皇庆二年春，子昂。’管道升墨画补新篁坡石，款署‘仲姬’。卷前孟頫又自题云：……”管氏款的青竹从构图上打破了赵氏《枫林抚琴图》的整体画意，显然是强加之作。图中的竹叶画法，与《赵氏一门三竹图》卷中管氏的画竹笔墨不相符，其落款“仲姬”，字的起笔收笔又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管道升《与中锋和尚信札》不相符。此外，据现藏于日本的赵孟頫《致中峰和尚六札卷》中之《幼女夭亡帖》而知，皇庆二年（1313）“正月廿日幼女夭亡”，他与管氏是哀怀伤切之极，并言“老妇（指管道升）钟爱此女，一旦哭之，哀嚎数日，所不忍闻”。是年春，赵孟頫请假回乡为先人立碑的假期已满，他不得不告别管道升，由吴兴赶赴京都任职。因此，赵氏夫妻在

〈1〉（元）赵孟頫：《松雪斋全集》外集，页10，光绪洞庭杨氏刊本。

〈2〉王连起：《赵孟頫为妻代笔》，《紫禁城》总第23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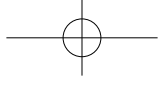
〈3〉元管道升：《深秋帖》，《元名家尺牍》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

〈4〉元管道升：《二哥久出帖》（暂名），《赵氏一门合札》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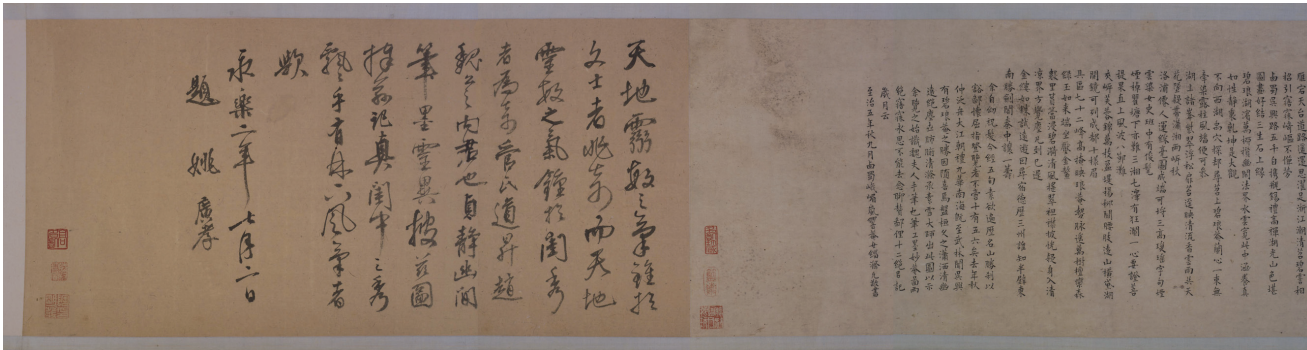
〈5〉元管道升：《久疏上状帖》，《赵孟頫管道升尺牍合璧卷》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

〈6〉（元）赵孟頫：《松雪斋全集》外集，页10，光绪洞庭杨氏刊本。

〈7〉徐邦达：《徐邦达文集·古书画鉴定概论》页66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5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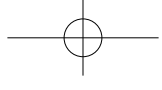
〔图八〕管道升《碧琅庵图》卷 吉林省博物馆藏



短暂的相聚时间内，不可能有时间和心情来以画自娱，绘制如此繁复细致的图卷，因此此画亦伪。

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的管道升《碧琅庵图》卷〔图八，现藏吉林省博物馆〕^{〔1〕}，同样也是赝品。

〔1〕 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：元管道昇《碧琅庵图》一卷（上等寒二中，贮养心殿），宋笺本，墨画。卷后自书《碧琅庵记》，云：“天下奇峰峭岭，惊波怒涛，（略）……管氏道昇识。”下有“仲姬”印一。又，尼素雪题识云：“幻化浮沤寄胜游，偏袒锡杖度春秋。（略）……至治二年岁朝素雪自识。”卷前有“永贞之印”、“殷澈”、“篮与”、“陶明发印”、“鴈湖陶氏鉴赏之章”诸印。卷后有“陶明发印”、“陶氏家藏世宝”、“鴈湖陶氏胜叔甫珍藏”诸印。前隔水有“子孙永宝”、“鴈湖陶胜叔甫珍藏印”二印。拖尾尼涤凡题识云：“碧琅庵畔碧云飞，竟日回环面翠微。（略）……承素雪大师出此图以示，余览之，始识魏夫人手笔也。笔工墨妙，庵图两绝，寤寐永思，不能去念，聊赘鄙俚十二绝以记岁月云。至治五年秋九月，西蜀峨嵋岚响庵女缙涤凡敬书。”后有“篮与”、“胜叔陶氏秘玩”二印。又，姚广孝跋云：“天地灵敏之气，钟于文士者非奇，而天地灵敏之气钟于闺秀者为奇。管氏道升，赵魏公之内君也，贞静幽闲，笔墨灵异，披兹图，捧兹记，真闺中之秀，飘飘乎有林下风气者欤。永乐二年七月二日题，姚广孝。”后有“胜叔真赏”、“陶明发印”二印。卷高八寸四分，广五尺七寸。（见《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·石渠宝笈初编》，第2册页587，北京出版社，2004年。）



徐邦达先生《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》记：“管道升《碧琅庵图》卷，伪劣。”杨仁恺先生的《国宝沉浮录》^①亦记其为“赝品”。关于该画卷伪劣的原因，两位先生均没做具体的分析。从《石渠宝笈》的著录中可知，此图是管氏造访友人女尼素雪所筑的“碧琅庵”时所绘。素雪在得到此图后，于卷尾跋：“感蒙魏夫人之护法并图庵中之寄兴，薪水殷殷可为出世之慈航也。然此图宜珍藏之，不可轻视而忽一点之义谛。至治二年岁朝，素雪自识。”从管道升的题和素雪的跋上看，题、画、跋本应作于同一时间，但是，令人生疑的是，素雪的跋是在“至治二年(1322)”，而管氏在延祐六年(1319)便过世了。又，管道升的题和素雪的跋中均流露出她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，但是，素雪却将管氏的封号“魏国夫人”，写成“魏夫人”。“国夫人”是外命妇中一级的封号，一“国”字之缺，其含义会全然改变，素雪如此的笔误，似乎不在情理之中。

管道升二十八岁时嫁给赵孟頫，五十八岁便病逝于山东临清。短暂的三十年中，赵孟頫官务缠身，管氏则承担着全部的家务，以致于当她过逝后，赵孟頫茫然不知所措，在给中峰和尚的《两书帖》中写道：“盖孟頫与老妻，不知前世作何因缘，今世遂成三十年夫妇，又不知因缘如何差别，遂先弃而去，使孟頫栖栖然无所依。”^②他在给中峰和尚的《醉梦帖》中亦言：“盖是平生得老妻之助整卅年，一旦丧之，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。”^③在繁重的家务拖累下，管氏本身创作的画作并不多，在所处的元代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影响，翻查有关元史方面的书，有关她的文献记载很少，多是在赵孟頫条目之后，简单地提一句：赵孟頫妻管道升亦擅书画等。管道升的画名，几乎完全是后世好事者依赵孟頫的声名，捕管道升擅画竹之影而炒作起来的。明末吴永编《续百川学海》甚至附会地说管氏著有《墨竹谱》，该竹谱实际上是后人抄袭元李衍《竹谱详录》里的《墨竹谱》部分再假托管道升之名的伪作。明清时期，管氏画竹被无限拔高，无论是男女画家，以学管氏的竹画为荣，以拥有管氏的竹画风格为耀。许多评论家也以管氏的艺术作为衡量竹画水平高下的一个标准。随着管氏被神话，伪造管氏名款的画作便在唯利是图的驱使下比比皆是，从《石渠宝笈》所著录的管氏作品中也可可见一斑。

[作者单位：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]

(责任编辑：张 露)

① 杨仁恺：《国宝沉浮录》页358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。

② 元赵孟頫：《至中峰和尚十一札册·两书帖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

③ 元赵孟頫：《至中峰和尚十一札册·醉梦帖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